

[illegible]

執行期間：88年08月01日至89年07月31日

共同主持人：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中華民國 89 年 10 月 30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族群與暴力：論烏托邦藝術

Ethnicity and Violence: On Utopian Art

計畫編號：NSC89-2411-H-002-036

執行期限：88年8月1日至89年7月31日

主持人：廖朝陽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

一、中文摘要

對族群認同自來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把族群認同當成一種正面的文化歸屬感，是團結弱者的共同點，抵抗強權，解除殖民的動力所在；另一種則近幾十年來西方知識界較普遍的看法，認為族群認同呈現自我封閉的傾向，含有仇視外人的心理，容易引發族群暴力、戰爭、動亂，是一種負面的力量。台灣學術界處理這個問題多數是採取社會學或公共政策、國際關係等「宏觀」的分析取向，本計畫則從文化理論的角度來探討族群認同在集體心理以及文化政治層面的含義。本計畫提出的做法是：分別由創傷理論及暴力理論入手，引用創傷主體的雙重特質（困乏化、絕對化）來延伸班雅民的暴力理論，以與前人不同的方式來解釋兩種暴力（純粹暴力、制法及毀法暴力）的分歧點，同時參照布洛赫對烏托邦的闡發，說明暴力是烏托邦的顛倒呈現，而兩種暴力的對比正相當於布洛赫提出的具體與抽象烏托邦的對比。這樣一來，布洛赫的說法就可以幫助我們確立班雅民所謂純粹暴力如果是斷離在外，不與實際權力或利益掛鉤，就會抽象化、純粹化，不但不會成為向未來「求現」的力量，反而是自我限制，「求避」具體暴力的基礎，也是根本民主的原則所在。這符合齊捷克認為笛卡爾主體不應取消，而應走向困乏主體，在分離中具有絕對性的立場，也點出要處理族群暴力，不能一味否定、壓抑主體的封閉性，而是要將文化經驗的特殊層抽象化，維持一個不與具體內容合流的斷離空間。用封閉來支撐開放，才是正確的做法。

關鍵詞：族群、文化認同、暴力、烏托邦

Abstract

There are two common conceptions of ethnicity. One takes ethnic bonding as a positive feeling of cultural belonging, a ground upon which to rally subalterns, an enabling source of drives toward resistance and decolonization. The other view, endlessly rehearsed by western commentators in recent years, imputes a tendency toward self-enclosure and exclusiveness to ethnicity, associating it with hatred toward the culturally unassimilated and therefore with wars, conflicts, and other form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Most domestic studies in this area are macroscopic, adopting sociological or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The present project proposes to consider relevant issues under the illumination of cultural theory to bring out the collective psychic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to account for their significance for cultural politics. Thus we propose to take theories of trauma and violence as starting points, using the dual disposition of the traumatic subject (split between destitution and absolutization) to extend Walter Benjamin's account of violence and to explain, in a new wa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kinds of violence (pure violence and mythic violence). Next we cite Ernst Bloch's account of utopia to establish violence as an inverse form of utopia and to indicate that when violence is "traumatized" (split/preserved in a separate, unsymbolizable psychic space), it will remain external to concrete power and particularistic interest and become abstract and "pure." Such virtualized violence is connected to concrete violence,

but, being blindly open to all, also grounds self-binding as a way to avoid excessive outbreaks of violence. This should be the principle of radical democracy. At the same time, our findings confirm Slavoj Žižek's thesis that the Cartesian *cogito* cannot be abolished but should be rearticulated as a destitute subject, absolute in separation.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disavowal of closed subjectivity is not an effective way to deal with ethnic violence. Better hope should be sought in the radical abstraction of cultural particularity and its psychic separation from concrete content, which allows closure to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of openness.

Keywords: ethnicity, identification, cultural identity, violence, utopia

二、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延續了申請人過去對民族想像、主體理論與歷史記憶的研究，也延續了透過心理分析理論與新馬克思派文化理論來解明主體與認同問題的路線。同時也希望能夠進一步引進比較屬於文化人類學式的觀點，討論理性與理性中斷（暴力）的問題如何呈現在公共生活的層次。這類文化理論的研究雖然是以較個人化的主體意識為觀察重點，似乎較適合處理文學藝術或符號意義，不適合正統社會科學所處理的實證問題，其實對後者卻仍然可以提供另一種觀察角度。不論是齊傑克的哲學化心理分析還是班雅民的神學式馬克思哲學其實都指向一個重點，也就是要真正解決族群敵意或族群衝突，靠的不是遺忘、壓抑，甚至也不能用空洞的「融合」來掩飾，而是必須正視其中先於文化造作的「自然史」基礎，接受文化認同裡含有不可化約的特殊性，才能進一步尋求切合實際的解決之道。近年來台灣的族群問題可以說常常出現在公共議題的爭論中。本計畫希望能提出一個較具文化理論基礎的講法，在千篇一律的「族群融合」說之外建立另一種思考的方向。

三、結果與討論

在《真實復出》一書裡，佛斯特指出創傷主體「擁有絕對的權威，因為沒有人能挑戰別人的創傷：你只能相信或不相信，最多是認同或不認同。在創傷的敘述裡，主體一方面被抽空，一方面也被提升。就這樣，創傷敘述巧妙化解了當今文化兩種互相衝突的指導原則：解構分析與認同政治。作者以奇異的方式獲得重生，缺席的權威以吊詭的方式存在。這是當前藝術、批評與文化政治的重要轉折」(Foster 1996: 168)。佛斯特在這裡的討論簡短的指出創傷現象的兩面性：創傷主體既是困乏主體，也是絕對化的主體。

創傷是暴力的容受。奇怪的是，困乏與絕對化也是班雅民在〈暴力批判〉文中提到的兩種解決利益衝突的模式。班雅民認為，個人與個人之間解決爭執，用的往往是「純粹」方法[reine Mittel]而不是「暴力的」方法，原因是「不論衝突結果誰佔上風，我們總是害怕暴力對抗可能對雙方都有不利的局面。有無數的案例可以說明，私人之間的利益衝突會引起這一類的考量。如果是階級之間或國家之間的爭執，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人群對這種勝敗雙方一起掃倒的更高的層次多半感覺不到，要有深入的認識更難。這裡如果要進一步追究這更高的層次，以及其中涉及的共同利益，未免牽涉太廣，但是這部份還是建立純粹方法的政治最可靠的動力所在」(Benjamin 1996: 245)。另一方面，純粹方法的政治呈現了「毀滅而不分化的暴力，也就是神的支配力」(Fenves 1998: 46)，也就是說，神的支配力就是絕對化的純粹暴力（德文 *Gewalt* 的意思包含暴力及支配力；見 Hamacher 1994: 172n2），同時在人間卻呈現為困乏（避懼未來）的非暴力。這裡絕對與困乏的背反與創傷主體的雙重性沒有不同，可以說表現出神性與受難經驗相通的奧義。

純粹暴力所以是純粹方法，是因為方法脫離目的，一方面造成方法的困乏，無法指向具體內容而造成傷害，另一方面則

是方法仍然無法脫離目的而自存，目的的暫時中斷反而可以指向更絕對，更符合正義的目的，這就是「方法交給人掌控，目的則只有上帝能決定」(Fenves 1998: 49)。這樣，純粹暴力就分為兩半，一半透過目的的延後提升絕對性，保留神（自然）介入具體歷史的可能（神的支配力呈現為人間的純粹方法），另一半則是方法（暫時）斷離在外，不與實際權力或利益掛鉤（Fenves 1998: 48f; Hamacher 1994: 110），透過內容的困乏來進行抽象化、純粹化（人間的目的被擱置而帶出超越人間的正義）。這樣的暴力不會成為向未來「求現」（滿足私利）的力量，反而因為目的的延後而引發共同利益的考量，成為主體自我限制，求避具體暴力的基礎。

純粹暴力先於內容的建置，也「先於時間，所以無法表述」(Hamacher 1994: 112)。這符合齊捷克認為笛卡爾主體不應取消，而應走向困乏(*destitute*)主體，在分離中具有絕對性的立場(Žižek 1999)。乍看之下，主體的困乏似乎是暴力的縮減：就像尤里西斯為了避免聽到魔音不能自制，命令船員把自己綁起來，「純粹方法」裡主體的自我設限似乎也是一種「自綁」，符合根本民主的原則(參見 Salecl 1994: 93-96)，從而班雅民由純粹方法引出純粹暴力，把焦點轉移到玄虛的「更高層次」，模糊了暴力與非暴力的界限，似乎是過度理想化，為了想像某種無目的、無內容，不會落入制法、執法暴力的循環而失去現實感(92)。問題是「自綁」的前提是接受對方（魔音）的暴力，所以暴力如果不能普遍化而脫離特殊位置，「自綁」如果只是針對特定暴力的閃避，暫時的妥協與讓步終究只能隱藏而不是取消暴力，一旦涉及「階級之間或國家之間的爭執」就會失去效力。這不符合根本民主的精神，反而是方法的「妥協與奴化」(Hamacher 1994: 112)。在班雅民的想法裡，歷史的傷害所以造成，並不能歸咎於暴力，反而是因為暴力不夠徹底，不夠純粹，在歷史過程中「奴化」而失能。

班雅民也說：革命暴力是「純粹暴力

在人間的最高呈現」(Benjamin 1996: 252)。這個說法顯示純粹暴力仍然有可能進入現實，打破制法、執法暴力的循環。當然，革命暴力是困乏的呈現，其中仍然含有非暴力甚至反暴力的背反。革命追求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未來，是烏托邦的具體化。按布洛赫的分析，具體烏托邦有別於抽象烏托邦，因為前者「根據的是尚未存在，但可以預期〔的未來〕」，也就是說，它不會迂迴空轉，在空洞的可能性中迷失方向，而是會指向真實可能性，為其到來做好心理準備，」(Bloch 1986: 1.144)。烏托邦是尚未實現的理想，含有革命暴力的困乏，但是具體烏托邦建立在對（未完成）現實的認知上，所以又含有真實性。所以布洛赫所謂的具體其實仍然預設了現在與未來的分離。這樣的分離也顯示具體烏托邦要求的必然是徹底打破現存體制——如果只涉及個人狀況的局部改善，那麼不是合理的期望就是白日夢，只能有心理補償的作用(參見 1.33)。這裡抽象與具體的分別就相當於班雅民討論的政治罷工（暴力）與無產階級罷工（非暴力）的分別(Benjamin 1996: 245f)；也就是說，抽象烏托邦反而是因為不能維持方法與目的的距離而落入意識形態的框架，「抽離了現實當中最具強度的，也就是未完成現實的部份」(Bloch 1986: 2.624)，不能認知真實的可能性。布洛赫以不同的方式陳述純粹性的層次，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抽象與具體、方法與目的之間的複雜關係。

烏托邦的動力來自開放的可能性，但是開放不以封閉性的分離、絕對化為前提，就有脫離真實的危險，布洛赫自己對各種文化呈現的處理往往過於僵化，不符合自己理論認知 (Geoghegan 1996: 151f)，應該是用具體（現在性）來陳述分離（未來性），反而可能把封閉當成方法產生的盲點，這裡不必去追究所以如此的個人或歷史因素。本計畫強調的是，班雅民的暴力理論告訴我們，要處理族群暴力，不能一味否定、壓抑主體的封閉性，而是要將文化經驗的特殊層抽象化，維持一個不與具體內容合流的斷離空間。用封閉來支撐

開放，才是正確的做法。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從文化理論的角度來處理暴力問題，研究結論對目前台灣學界對族群互動關係的了解可以有重要的啟發。特別是本計畫從基礎研究的層次入手，不選擇實證式的研究取向而改以人文面向為重心，一方面能掌握一般社會科學研究不能顧及的盲點，另一方面又能旁及社會學科的研究材料，引進相關社會學科的觀點與理論架構，增加文化分析的整合性。

就計畫的執行而言，Adorno 索討論的「自然史」觀念涉及複雜的思想史演變，原計畫中這一部份與其他討論架構整合不易，暫時無法納入計畫成果。而 Benjamin 思想裡神學背景這部份牽涉也較複雜，執行過程中轉而強調其暴力理論裡所含的政治學意含，特別是最近出現的幾種解釋，並配合原計畫未列的創傷理論提出創新的解釋。其餘各部份都進行得相當順利，最後將各部份整合為完整理論架構的工作也水到渠成，獲得相當有說服力的成果。雖然研究過程偏重暴力觀念在理論層次的推演，對族群問題大致上沒有直接觸及，但是研究成果的動機與指向仍然是以族群問題為主要考量，具體的關連有待往後研究繼續在「應用」的層次詳細鋪陳。

另外，原計畫所擬選擇文學作品或電影，納為非正式的分析對象，意在以具體文化材料的阻抗與限制來防止理論探討空洞化。執行過程中曾經分析的材料有 Spike Lee 執導的電影 *Do the Right Thing*, Andy Wachowski and Larry Wachowski 執導的 *The Matrix*, 吳念真執導的《太平天國》，林正盛執導的《天馬茶房》、李昂的小說《自傳的小說》等，最後選擇以 Ridley Scott 執導的電影 *Blade Runner* 為重點。納入即將完成的論文〈《銀翼殺手》的斷離空間〉（原發表於第七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台北，2000 年 11 月 18 日）。

綜合而言，本計畫執行尚稱順利，但材料過多，總成果一時呈現不易，將納入

未來相關研究，繼續發展。同時今後類似的規劃也應申請多年期研究，以免時間過於倉促。

五、參考文獻

- Benjamin, Walter (1996)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1913-1926. Ed.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 Bloch, Ernst (1986) *The Principle of Hope*. Trans. Neville Plaice, Stephen Plaice, and Paul Knight. 3 vol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Fenves, Peter (1998) "'Out of the Order of Number': Benjamin and Irigaray Toward a Politics of Pure Means." *Diacritics* 28.1: 43-58
- Geoghegan, Vincent (1916) *Ernst Bloch*. London: Routledge.
- Hal Foster (1996) *The Return of the Real: The Avant-Gard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Cambridge: MIT Press.
- Hamacher, Werner (1994) "Afformative, Strike: Benjamin's 'Critique of Violence.'" Andrew Benjamin and Peter Osborne, eds. *Walter Benjamin's Philosophy: Destruction and Experience*. London: Routledge. 110-38.
- Salecl, Renata (1994) *The Spoils of Freedom: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after the Fall of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Žižek, Slavoj (1999)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er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Verso.